

September 2017

The Semiotical Expansion of Critical Theory: The Semiotical Methods in Baudrilard's Academic Research

Jian'gang Y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g, Jian'gang. 2017. "The Semiotical Expansion of Critical Theory: The Semiotical Methods in Baudrilard's Academic Research."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5): pp.140-15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5/1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批判理论的符号学拓展

——鲍德里亚学术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

杨建刚

摘要: 鲍德里亚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家。虽然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符号学是贯穿始终的方法论。正是符号学方法的运用使其学术生涯呈现出断裂与联系的内在张力。通过将符号学引入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时尚和艺术品拍卖及其体现出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进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此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正是将符号学方法推向深入,促使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艺术和传媒等文化景观的批判中发展出了拟像、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等学说,并以此把海湾战争作为一种媒介事件展开批判,从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

关键词: 消费社会; 物体系; 符号政治经济学; 仿真; 媒介事件

作者简介: 杨建刚,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邮编:250100。电子邮箱: yangjiangang78@163.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11CZW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编号:2015WLJH02]资助。

Title: The Semiotical Expansion of Critical Theory: The Semiotical Methods in Baudrilard's Academic Research

Abstract: Jean Baudrilar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Marxism and Semiotics. Although he changed from a Marxist to a Post-Marxist, semiotics has always been his methodology throughout his academic career. This intrinsic tension between breakage and connection is primarily caused by the usage of semiotics. By introducing semiotics into Marxism, he began to analyze and criticize the object system, fashion, auction of work of arts and the consumer ideology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formulated his uniqu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As a result, h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classical Marxism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Also because of the usage of semiotics, he deviated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roduction theory of Marxism and put forward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simulacrum, simulation, implosion and hyper-realism, and criticized the Gulf War as a media event. Ultimately, he became a typical postmodernist.

Keywords: consumer society; object system;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imulation; media event

Author: Yang Jian'g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Address: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No.27, Shanda South Rd.,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Email: yangjiangang78@163.com Fun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of China (No.11CZW010) and the Young Scholars Program of Shandong University (No.2015WLJHOZ).

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鲍德里亚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

义用于消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另一种则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如果说列斐伏尔和巴

特用语言学方法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是语言(符号)批判理论的开端的话,那么“将符号学方法阐述为一种完备的批判理论的工作是由让·鲍德里亚完成的”(波斯特 25)。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和理论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渊源关系,也正是在二者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鲍德里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符号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消费社会中的文化、艺术和传媒等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波斯特将鲍德里亚的这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之上的符号学方法统称为“批判符号学”(Critical Semiology),并认为这种方法“为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提供了真正的基础”(Poster 284)。波斯特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鲍德里亚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学术界通常将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划分为前期的马克思主义、中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最后的决裂期三个阶段(Kellner Jean Baudrillard)。虽然在这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鲍德里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符号学却是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而且,他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都是因为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而导致的。通过将符号学引入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进行了分类和研究,并对消费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符号社会学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此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同样,也正是将符号学方法推向深入,促使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后现代文化景观的批判中发展出了拟像、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等学说,从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以符号学为切入点分析鲍德里亚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如何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对于鲍德里亚自身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是有必要的。

一、消费社会物体系的符号学批判

在鲍德里亚进入学术生涯的道路上,虽然很多学者和学说都对他产生了影响,比如凡勃仑的

有闲阶级理论、巴塔耶的过剩和消耗理论、莫斯关于礼物的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拉康的镜像理论等,但是真正帮助他奠定学术立场并形成研究方法的还是以亨利·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以索绪尔、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方法。在1966年进入南特大学任助教之前,鲍德里亚一直在一所中学教授德语。在此期间,他已经阅读过尼采、赫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并曾将布莱希特等人的德文文章翻译成法文。后来,在1968年,他还参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法语翻译工作(布希亚,译序13;仰海峰7)。鲍德里亚进入南特大学之后便在列斐伏尔的指导下撰写并完成了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同时还参加了巴特在巴黎高师的研讨课,与巴特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他们二人还相约一起去听过萨特的讨论课(布希亚,译序3)。可以说,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正是在列斐伏尔和巴特的影响下,在二者所分别代表的理论和方法的张力中开始的。他早期的三部著作《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相结合,用符号学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进行补充、丰富和发展。

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出发,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引入了日常生活领域。列斐伏尔思考并写作《日常生活批判》后两卷之时正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如日中天之日,因此他的日常生活批判难以摆脱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影响。《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就开辟专章讨论了语义领域中的诸如语言、符号、象征、声音、图像等符号学的核心问题,而索绪尔和巴特等符号学家的学说正是其展开讨论的理论资源(Lefebver, *Critique* 276-314)。进而,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列斐伏尔也对巴特刚刚出版不久的《时尚体系》及其所关注的时尚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分析(Lefebver, *Everyday* 163)。可见,虽然列斐伏尔年长巴特十多岁,但二者之间的忘年之交对他们各自学说的发展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都加于鲍德里亚的学术成长历程之中。

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被充斥着的各种物所包围,与这些物发生关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或者说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因此,对

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研究和分析就成为日常生活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鲍德里亚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也正是对列斐伏尔的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巴特的符号学给予了鲍德里亚分析这一物体系以方法论。《物体系》中对物所进行的语义分析显然参照了巴特分析流行服装的符号学方法,因而时时“回荡着巴特的《时尚体系》的声音”(雷契 108),并被看作是“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书之一”(凯尔纳 36)。

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体系中,系统、结构、对立、差异等是最为核心的术语和范畴,也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尤其是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差异关系已经成为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索绪尔对于语言系统的论述,还是巴特以此为方法对服装体系的符号学分析,都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这一原则为鲍德里亚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从而使他在继承了其导师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同时,又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发展了列斐伏尔的学说。在鲍德里亚看来,对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琳琅满目的物进行研究,就必须把这些物看作一个符号系统才有可能。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物都不是一个自在之物,而是具有功能和意义的符号——物-符号(Object-Sign)。而任何物要成为符号,就必须承载意义,即与人类世界发生关系。因此,对物-符号的研究也就转化为对物与人类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而研究方法也就自然可以借用符号学的结构语义分析。在物的体系中,每一种物与体系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音素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他写作《物体系》的目的就是对充斥于消费社会的物进行“物的结构语义系统分析”。

但是,鲍德里亚也清楚地看到,物的体系与语言体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同于语言系统的独立性,物的科技层次并不具有结构自主性,也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这一系统的目的在于宰制世界和满足欲望,因此也就难以脱离实践,并依赖于科学研究的社会条件,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全面体制。由此可见,虽然用符号学来研究和分析消费社会的物体系是一种切实可行且具有解释力的有效方法,但是不能忽视物的体系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因为前者还具有不含意义的技术

层面,而后者则完全是一种意义系统。因此,根据所包含意义的程度不同就可以将物体系划分为功能性系统、非功能性系统、后设及功能失调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等不同类型,而对这些类型的符号语义分析也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

室内家具的摆设结构和构成室内气氛的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结构属于典型的物的功能性系统。前者侧重于室内结构的技术层面,后者侧重于室内环境的文化层面。对功能性系统中的物的研究,并不关注于物的自然性,而在于“它和真实世界及人的需要间的准确[适应]关系”(布希亚 72)。室内家具不仅仅发挥着它作为家具的自有功能,而且其组合方式还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结构关系和情感关系。选择高档家具还是廉价家具体现了主人的经济实力,而选择古典家具还是现代家具,以及家具的摆放位置、房间的装修风格等则体现了主人的审美趣味、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成员的情感结构等等。也就是说,物的功能或意义并不是以它的自然性,而是以它被整合进一个体制或系统中的能力为依据。纳入系统的能力越强,它对人类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在一个功能性系统中,物必将不再只以自在的方式存在,体现着物所具有的实用功能,而且还以符号的方式存在,发挥着符号所具有的承载并表现物与人类存在之间关系的功能性意义。

物的非功能性系统完全关注于物所具有的文化符号意义。古物和收藏品就属于典型的非功能性物品。对于一个古物来说,它原有的功能已经消退,而其作为古物所具有的历史性则被凸显出来。它代表着历史和时间,呈现的则是物所具有的“见证、回忆、怀旧、逃避”等非功能性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古物作为符号,“因为它逃过时间之劫,因此成为前世的记号”(布希亚 94),一种“时间的文化标志”(86)。现代人之所以迷恋古物,并对古物进行保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起源的怀念。另一原因则是对本真性的执迷,通过古物我们可以保存文化的真实过去。古迹修复中强调“做旧”,就是使古迹保持原有的样貌,从而使真实的历史状貌和文化现实得以保存。收藏则是对一种不具有实用功能的文化符号的拥有。鲍德里亚区分了功能和拥有这两个概念,并对应于物品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两个情况:为人所实际运用

和为人所拥有。只有当一个物品从它的实用功能中抽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纯粹的符号的时候,才能成为拥有的对象。所以,收藏家所迷恋的并不是物本身,而是物所体现的文化符号。

在后设及功能失调体系中,物不再以原有的功能出现,而是从中引申出一种新的文化意义。这个体系中的物的产生和特性主要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使劳动工具快速自动化,从而改变了物品原有的特性,并使其具有了拟人化特征,无论是在外形还是在用途上都带有人的存在和人的形象的清晰印记。那些无意义的小发明、没有明确功能或功能尚未被认识的小玩意儿,以及科幻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作为人的拟像的各类机器人均属此类的物。在物的符号体系中,如果我们把有明确功能的机器看作功能的“语言”(langue),那么诸如小发明、玩意儿和机器人等则属于具有主观性的“言语”(parole)。前者类似于人体的骨架,形成了物体系的基本架构,后者则类似于人体的血肉,使物的体系更加丰满而有趣。

符号学方法最集中地体现在第四类,即消费社会中物的意识形态体系。在鲍德里亚看来,前现代社会中物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同类物品的功能差异较小,外形的区分幅度也不大,因此其风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现代物品却处于复杂的差异性结构之中,受到模范和系列这一二元对立的管辖。所谓模范就是物品中的典范之作,而系列则是与模范有差异的同类物品。这种差异可以是功能的、品质的、风格的、材质的、形式的等多方面的。比如一个品牌的皮包,它的经典款是模范,而同一品牌的其他产品与经典款相比就属于系列。同样,如果把名牌看作模范,那么对同一款产品的模仿性商品则属于系列。模范与系列之间的差异往往不是本质性和功能性的差异,而是源自于消费者的心理因素的个性化方面的差异。一个人把自己最喜爱的一件特定商品看作模范,那么其他同类商品便成为系列。因此,模范并不具有统一的既定的特征,而是可以随着环境、文化和个人喜好在系列中变化的。或者说,模范是系列被选择的结果,是系列中某一物品被标出。消费社会的广告中销售的各类产品都是通过制造差异而使某一特定产品在同类产品的系列中具有标出性而成为模范,从而吸引消费者进行购买。模范和系列之间的差异结构,以及模范所具有的

强制性要求,促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以模范为目标。模范与系列之间差异的不确定性及其心理化特征又促使模范具有变动性,而且模范的变动要比系列的变动快得多。也就是说,模范都是暂时的,系列永远处于追求成为模范的动态之中。消费社会的广告和流行时尚正是通过制造这种差异而运作的。

二、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西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的分析为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立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被无处不在的物-符号所充斥,而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必然“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消费社会》2)。物的符号特性导致对物的追求和积累很大程度上是对物所承载的符号意义的追求和积累,对物的消费也很大程度基于物所包含的差异性关系,而这种差异性关系所表征的则是人的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的区分。物的这种区分功能使物不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而且还具有一种符号所特有的社会价值——符号价值。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关注于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物-商品的这种符号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消费社会具有解释力就必须向前发展,将物的符号价值纳入其中。基于此,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构想,以此来补充、丰富、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显而易见,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将符号学方法引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建构起来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引入符号学方法并不是鲍德里亚的首创。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系统的符号学理论,但却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①在马克思看来,“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马克思 100)。货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马克思 恩格斯 144),它与其所代表的价值分离,也与铸造货币的材料无关,无论是金、银、铜还是纸币,其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是不变的。鲍德里亚就把货币看作“第一种获得符号地位并且逃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象征交换与死亡》27)。索绪

尔在讨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时也以货币为例,将能指与所指比做货币的两面。因此,鲍德里亚认为:“语言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等同关系早在先于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就已经存在了。如果符号政治经济学(符号学)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途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形式上的相同,而不是内容上的相同:符号的形式与商品的形式是相同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19—20)。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能指与所指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在结构关系和运作逻辑方面存在的这种相似性,使鲍德里亚坚信,将符号学引入政治经济学,从而建构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不但可能而且可行。

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第一任务自然是对其运作模式的分析。鲍德里亚提出并分析了物的交换过程中所遵循的四种不同的价值逻辑: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和象征交换的逻辑。这四种逻辑分别遵循四个不同的原则:有用性、等同性、差异性和不定性。物在这几种逻辑中所对应的分别为器具、商品、符号与象征。根据这几种逻辑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鲍德里亚区分了四类十二种情况,并对每一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这四种价值逻辑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着重讨论了前两种,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更关注后两种。其中,象征交换也是以物的符号意义为基础的,比如赠品、礼物等,因此也是物的符号价值的一种体现。不同在于象征交换中物的符号意义是象征性和不确定的,并不具有固定的符号价值。或者说,它是以赠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为依据。婚戒不同于日常的普通戒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象征价值,它是婚姻的符号和标志,一旦被赠与便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物品,因此具有持久的意义。在这四种逻辑中,只有符号的差异逻辑界定了消费的领域,在这个逻辑中,符号消费成为身份、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任何物都无法摆脱成为符号的可能性。鲍德里亚甚至认为,虽然物在使用价值或功能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不同价位或品牌的同类商品其功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常常不过是符号的差异性功能的一种外化,或者甚至就是作为一种噱头而被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物的功能性差异在消费社会的物体系

中已经成为表征着地位、身份等区分的符号差异的一部分。

以符号学为方法展开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大任务。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的意指关系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之间是一种同构性关系,一个物或商品的符号价值也是以符号的能指为基础的,对符号价值的追求事实上是基于对能指的崇拜。这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所分析和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中就演化成了“能指拜物教”。这种“能指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并贯穿于符号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但是二者的性质存在很大不同。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依据,因此“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 恩格斯 124)。但在鲍德里亚看来,在符号交换中,“符号形式征服了劳动,掏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或力比多意义,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这就是符号的操作,它在空洞地影射自己所指称的事物之后,在自身得到重复”(《象征交换与死亡》10)。因此,如果我们称商品拜物教是一种生产性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能指拜物教就是一种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鲍德里亚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的神秘性思维之中,因为这种批判并不将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形式,而是看作内容,看作一种给定的、超验的价值。但是,如果采用符号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不难发现,“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个将象征性物质载体还原为、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40),而能指拜物教“实际上与符号-物关联起来,物被掏空了,失去了它的实体存在和历史,被还原为一种差异的标志,以及整个差异体系的缩影”(《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80)。因此,结构主义的符号意指分析也就成为“能指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集中体现在鲍德里亚对时尚和艺术品拍卖的符号学分析与批判。

(一) 时尚的符号学分析与批判

鲍德里亚沿袭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认为时尚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表征。现代性具有两种时间向度,一种是线性的矢量时间,

另一种是循环时间。现代性就是这两种时间的辩证法,它既是新生的,也是追溯的,既是现代的,又是过时的。在鲍德里亚看来,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和历史的发展属于线性时间,而时尚则属于循环时间。在时尚领域中充满了决裂、变化与革新,其中既有新潮和创新,又有复古和怀旧。构成时尚的符号元素的有限性致使在时尚的变化和更替中不断从已经过时的时尚元素中寻求启发,从而使流行时尚成为现代性时间辩证法的集中体现。同时,时尚的变化并不以物的生命长度和耐用性为尺度。从物的自然构成来说,每种物都具有自然的生命长度和淘汰周期。比如冰箱、洗衣机、玩具、服装等物品直至其使用价值被耗尽时才被更新或淘汰,此时的物就不属于时尚的范畴。作为符号,时尚并不反映自然需求的变化,不以物的使用价值为依据,而是以物的符号价值所彰显的差异原则和区分功能为旨归。如果说作为实用对象的物体现了社会的稳定性,那么作为符号的时尚则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时尚的更迭速度体现的是社会流动的快慢和阶级固化的程度。因此,西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西美尔 72)。时尚具有分化和同化的双重目标。从时尚的生产和操控来看,时尚总是被较高阶层所把持,从而使其与较低阶层区分开来。但是,时尚同时也具有一种补偿功能,较低阶层总是试图通过对较高阶层所掌控的时尚的追逐和模仿而弥合这种阶级或阶层的差别,从而获得一种心理的安慰和补偿。而一种时尚一旦被较低阶层普遍追逐和模仿,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并生产出新的时尚以示区别。正因为时尚的这种双重性,使时尚本身不断地自我革命。每一种时尚的壮大和流行都预示着自己的死亡和毁灭。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作为阶级符号的时尚“不过是那些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化的平等以及社会区分的有效机制之一,通过在表面上消除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来建构不平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8)。时尚的补偿功能使较低阶层在时尚的追逐和模仿中表面上获得了一种阶级的平等,而上层阶级对时尚的创新却又实际上不断地强化着阶级的不平等。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时尚符号的分析

所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立场。鲍德里亚认为,西方的时尚批评已经由 19 世纪的右派思想转向了左派,因为时尚腐蚀了风俗,也消除了阶级斗争。时尚批评的向左转并不意味着历史的转折,而可能仅仅意味着“从道德和风俗方面看,左派接替了右派,以革命的名义继承了道德秩序和古典偏见”(《象征交换与死亡》131)。时尚研究的批判立场不仅标志着时尚批评的深化,也意味着左派理论的拓展。

(二) 艺术品拍卖的符号学分析与批判

鲍德里亚认为,艺术品拍卖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地,极大地体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运行规律,因此成为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典范例证。拍卖是一种融经济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等多种价值于一体的交换方式或游戏活动。在一般的商品消费中,经济的交换价值(货币)转化为符号的交换价值(声望等),但仍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基础而获得其交换的合理性。但是艺术品并不具有明确的使用价值,艺术消费也基本不考虑对象的使用价值。购买名画不是为了补壁或装饰,购买稀世陶瓷不是为了作为盛饭的器皿,购买文物也不是为了日常使用。尤其是在艺术品拍卖的竞价活动中,价格的变动和飙升使其交换价值(货币)与符号价值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特殊关系之中。此时,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运作规律已经失效,因为拍卖中出价的多少并不是以使用价值为标准,而是演变为以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争夺为目标的一种游戏甚至赌注。对一幅名画、一件稀世陶瓷或者文物来说,其使用价值非常微小,甚至没有,交换价值却无穷大,因为它所付出的货币并没有确定的数额,不是以生产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依据,而是以竞买者的支付能力和心理预期为标准。而竞买者之所以会对艺术品不惜代价趋之若鹜,就是因为对它的拥有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品位和名望的象征与区隔的标志。因此,一件艺术品越是稀有,其符号价值就越高,它的拥有者与大众或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的区分度也就自然更加明显。当然,艺术品拍卖也与竞价者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但是,正如布尔迪厄所发现的,审美趣味并非康德所主张的无功利,相反,它本身也具有社会区分功能。如其所言:“审美配置也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特权位置的一种区分表现,而社会空间的区分

价值客观上是在与从不同条件出发而产生的表现的关系中确定自身。[……]趣味(也就是表现出来的偏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差别的实践证明”(92—93)。趣味的培养和形成与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家庭阶层、学识涵养等密切相关,因此是与“一个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它不但塑造着一个人的自我,而且把具有类似趣味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趣味的共同体。表面看来趣味仅仅是个人性的,其深层实际上则是一种阶层甚至阶级地位的区分问题。物-符号、艺术品乃至趣味的这种区分功能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和占有稀有符号。布尔迪厄区分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并认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符号显然已经渗透于这几种资本之中,从而成为一种特权的表征。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统治阶级总是或者将它的统治从一开始(原始社会与传统社会)就建筑在符号/价值之上,或者(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努力试图以符号语言的特权去超越、跨越经济特权,并且将后者神圣化,而符号语言的特权是最后的统治阶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06)。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品拍卖活动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种经济资本的角逐来实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区隔。

三、后现代文化景观的符号学批判

在《生产之镜》之后,鲍德里亚彻底否定了生产的重要性,认为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镜像,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力量应该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模式相反,是消费决定了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了消费。商品的价值不是在劳动过程而是在社会流通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样,鲍德里亚就彻底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甚至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在鲍德里亚的这一转变过程中,符号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第一阶段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结合起来”(凯尔纳 贝斯特 144),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第二阶段之后则是用符号学方法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成为一位彻底的“后现代性的超级理论家”(凯尔纳 贝斯特 143)。他的这一学术地位的建立正是通过仿真、内爆和超真实这个“三位一体”的

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文化的概括和阐释来实现的。

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体系中,作为核心范畴的仿真(simulation)是与拟像(Simulacrum,复数形式为 simulacra)^②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作为拟像的一个层级和阶段而展开分析的。拟像在西方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都具有悠久的传统,柏拉图的摹仿说已经是拟像的雏形,但是鲍德里亚使拟像在当代哲学、政治学和美学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Genosko 28)。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把拟像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以及三个平行等级。起始于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是仿造(counterfeit),现代工业时期的主要模式是生产(production),而仿真(simulation)则是目前受代码支配的后现代时期的主要模式,它们分别代表或呈现了封建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作为拟像第一等级的仿造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等级的生产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而第三等级的仿真依赖的则是价值的结构规律。

仿造是与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而这个解构过程正是由资产阶级的秩序和差异在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封建时期乃至古代社会,符号处于强制的受控制状态,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与界限分明的阶级区分和等级秩序相关联而不可随意使用。符号界限的打破就意味着阶级区分和等级界限的突破和僭越。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任意性成为符号的主要特征,所有的阶级和等级都可以不加区别和限制地使用甚至玩弄符号。鲍德里亚称这种特征为“符号的增生”。仿造就是这样一种符号增生行为,它通过诸如胸前的假背心、假牙、仿大理石室内装饰、巨大的巴洛克式的舞台布景等替代性符号来对已有的自然之物进行模仿,创造出一种其他物质的镜像,从而实现对符号等级及其控制的突破。

进入工业革命之后,拟像进入了生产阶段。在工业生产中,符号是没有种姓传统且可以被大规模生产的。生产的拟像是由两个或n个同一的物体构成,是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结果。在这个系列的符号中,没有原型与仿造的关系,也不

存在类比和反映,而是同一符号之间等价的无差异关系。在这个系列之中,物体成为相互之间的无限的拟像。生产作为符号秩序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只是由仿造到仿真之间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来生产无限的具有潜在同一性的存在、物体或符号。

拟像的第三阶段和等级是仿真。詹姆逊认为,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平面化的、破碎的、拼贴的、仿真的文化。鲍德里亚则将这种具有仿真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概括为超现实主义(hyper-realism),其基本特征则是超真实(hyper-reality)。仿真的这种超真实性是符号操纵的结果,而在构筑世界的各种符号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而形成的数字符号。因此,鲍德里亚认为:“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象征交换与死亡》72)。可以说,仿真以电子媒介或数字符号为主导的超现实主义文化和艺术的基本特征。在后期的《拟像与仿真》等著作中,通过对仿真的深化,鲍德里亚又将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作为拟像的第四等级。

从拉丁语词源上来说,拟像(Simulacrum)具有图像(image)、类似(semblance)或表象(appearance)的含义(Pawlett, “Simulacra” 196)。《牛津英语词典》将其解释为与一个事物相似的“像、影、模拟物”,从而强调了拟像的物质性。正因为拟像与图像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鲍德里亚以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为例对拟像的几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在第一个阶段,图像是对真实的再现和反映,从而与真实具有同一性关系;在第二阶段,图像作为一种能指逐渐开始脱离、掩盖甚至扭曲现实;在第三阶段,作为指涉对象的真实已经退场,而图像成为一种自我指涉的能指,并掩盖了真实的缺席,或者说成为了现实的仿真或超真实;而到了第四阶段,图像则成为与现实毫无关联的纯粹拟像或虚拟真实(Baudrillard, *Simulations* 11)。鲍德里亚将图像的这四个阶段所表现的现实秩序概括为“神圣的秩序”“邪恶的秩序”“巫术的秩序”和“模拟的秩序”(《生产之镜》192)。可见,从再现到虚拟真实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图像或符号不断地自我增殖,而真实却在不断地退却,最终所形成的则是一种由图像或符号自身所创造的一种超真实或虚拟真实。这种脱离

了所指和现实指涉的超真实或虚拟真实不是“真实”,也不是“非真实”,而是“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符号学效果”(Pawlett, *Jean Baudrillard* 71)。

现代技术推动下的人工智能、全息摄影、实时记录、远程遥控等都在合力创造一个逼真的虚拟世界,包括影像的虚拟(电影)、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色情图)、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或染色体组)等。在鲍德里亚看来,在这一系列的虚拟世界中真实变得无关紧要。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所创造的符号世界,而不再关注这个符号世界得以产生和赖以生存的外在现实,甚至将仿真所创造的超真实当作现实本身。“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博德里亚尔 8)。在影像符号所创造的拟像中,现实世界就这样消失了,但是它的消失是如此地自然,致使人们觉得连对真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追问都没有必要,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如果将符号对真实的这种吞噬过程比作一场谋杀的罪行,那么,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就是一场堪称典范的“完美的罪行”。

可见,对真实所发起的这场谋杀是一种符号操纵的结果。鲍德里亚借用麦克卢汉的概念,称这种符号操纵的方式为“内爆”。麦克卢汉提出了外爆(explosion)与内爆(implosion)这对概念。外爆是传统的生产性社会或机械时代的发展模式,指的是社会能量从中心向边缘的缓慢拓展的单向发展,表现为商品生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积累、殖民地的开拓、社会领域的不断分化和学科界限的壁垒森严等。而内爆则是电力或电子媒介时代的发展模式,指的是社会能量以电的速度瞬间发生的内向爆炸,表现为“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我们专门化的、分割肢解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文明,突然又将其机械化的碎片重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麦克卢汉 114)。鲍德里亚深受麦克卢汉的影响,并将“内爆”用于对后现代社会中的传媒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电子媒介造成的“内爆”使真实与非真实、媒体与社会等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甚至人们从前对真实的那种独特的感知体验也已经消失了。网络技术、电子媒介、电视电影等都在不

断地制造和生产着一个仿真甚至虚拟的世界,并给人一种比真实世界更真实的感觉。因此,大众媒介所生产的这种“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过的真实”(凯尔纳 贝斯特 154)甚至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理想化模型。在此,不再是模型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模型。比如,迪斯尼乐园就是美国生活的模型,它比真实的美国还真实,或者说,美国正在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同样,现实不断地向电视节目所塑造的模型接近,并以其为标准评判现实本身。

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关于超真实的这几大主题的集中体现莫过于他对海湾战争的深入分析。海湾战争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鲍德里亚却在战前预测“海湾战争不会发生”,战争期间质疑“海湾战争真的发生了吗”,并在战后断言“海湾战争没有发生”。鲍德里亚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论断,是因为他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海湾战争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媒介事件加以分析的。

首先,如果说传统战争是一场血与火相互交融的“肮脏的战争”(dirty war),那么海湾战争则是一场电子媒介技术充分参与,通过卫星信息而生产的类似于“无性的外科手术式”的“干净的战争”(clean war)。这种电子化的高仿真战争在战前表现为采用现代3D立体成像技术,对战争场面进行全方位的模拟。虚拟的武力推演形成了类似于冷战的庞大的威慑力,而这种威慑力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和形态,甚至能阻止战争的真实爆发。同时,在海湾战争过程中不仅使用最先进的武器,而且是通过电子网络技术的远程操控来进行的。战争中的敌人不是面对面的手持武器的军人,而是计算机屏幕上的目标。这样,海湾战争就像网络游戏一样,成为一场仿真的、威慑性的模拟战争。

其次,海湾战争是一场由符号和图像构成的“屏幕上的表演”。用电视来转播和报道战争并不新鲜,但是以直播的方式报道战争则是在海湾战争中开了先河。这种电视直播使全球观众在第一时间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海湾战争的场面和进程。但是,这种电视直播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仿真的战争。在观看电视直播时,观众懒洋洋地蜷缩在沙发上,一边吃着零食聊着天,一边像观看好莱坞的战争大片或越战电影那样观看着屏幕上的

战争报道和场面。海湾战争中的流血和死亡并不能激发观众对死者的同情和对战争的抵制,甚至反而会产生观看好莱坞大片一样的快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观看效果,是因为观众混淆了真实战争的电视直播和好莱坞大片之间的文体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湾战争“只是电影院里的战争:脚本化的,特殊效果的,当灯光熄灭时,一切都各得其所和处于安全之中”(毕晓普 凯尔纳 56)。

再次,海湾战争的电视直播和媒体报道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符号操作和编码的结果。媒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往往通过选择性原则使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或统治阶级的行为合法化,并同时排斥其他反对声音的存在。西方媒体对海湾战争的报道都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需要和舆论宣传的目的而进行严格的选择、剪辑、审查和加工处理。报道的多是联军的高端武器和胜利,而战争中的伤亡、难民的生活,以及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等却都被屏蔽掉了。电视屏幕中所展示的高端武器所准确击中的基本都是建筑物而不是阿拉伯士兵,从而突出这场战争是以极少的伤亡取得的胜利。甚至电视报道中的很多目击证人都是经过选择和安排的,因此他们的证言也不足为信。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与其说西方媒体所再现的是真实的海湾战争,不如说它是一场服务于战争各方的多样化的政治和策略性目的的奇观(*The Gulf War* 10)。或者更极端地说,海湾战争甚至就像对登月事件的报道那样成为一种在演播室中生产出来的共谋性事件。

最后,电视媒体是以收视率为生存根基的,而为了保证收视率,媒体会对节目进行不断的强化、快速的更新,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事实上,关于海湾战争的媒体报道也是如此。鲍德里亚指出:“传媒推动战争,战争也推动传媒”(*The Gulf War* 31)。在战争期间,西方媒体会对海湾战争进行密集的频繁报道,从而影响观众对战争的态度,获得观众的关注、理解和支持。而战争一旦结束,战争期间关于海湾战争的集中报道很快就会被其他热点新闻和娱乐节目所替代,从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就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鲍德里亚断言“海湾战争没有发生”。显然,鲍德里亚的这一论断并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从纯粹的符号分析的

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他并不是要否定海湾战争的真实存在,也并不是说他没有看到惨烈的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海湾战争的符号学分析来对西方后现代媒介文化的运作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因此,当有人建议他去海湾战争的现场去体验真实的战争时,鲍德里亚戏谑地说他更喜欢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阿兰·巴丢(Alain Badiou)认为只有真正被介入讨论的事情才能够成为事件(event),而只有真诚地介入事件才能使一个人成为主体,真理也正是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才得以彰显(Bartlett 40)。齐泽克也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建构的变化”(13)。事件并非是定型的,而是处于过程之中。事件的意义就是通过主体的积极介入和真诚讨论才得以形成并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湾战争显然是一场事件,而且是一场西方媒体有意制造出来的“媒介事件”。正是鲍德里亚从符号学角度对于作为媒介事件的海湾战争的积极介入和深入分析,才使海湾战争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所赋予的意义,从中也体现了鲍德里亚对于后现代媒介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性的反思和批判。因此,鲍德里亚对于海湾战争的分析虽然难免偏颇和片面,但也非常深刻。他的分析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媒介景观的核心问题,而其“片面的深刻性”则为我们思考后现代媒介文化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视角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 语

尽管鲍德里亚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几个发展阶段,但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却是贯穿其学术研究之始终的基本方法。正是这一贯穿始终的方法论线索的存在,使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呈现出断裂与联系的内在张力。学术界对他的这种断裂关注较多,却往往忽视这种贯穿始终的符号学方法,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阶段的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虽然鲍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并没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后期还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断裂,但是他对西方消费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仍然持一种

非常鲜明的批判立场。尤为重要的是,他借用符号学方法对西方消费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后现代媒介景观的反思和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有效地改变了批判理论侧重理论思辨而缺乏实证分析的传统,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被学术界概括为“批判符号学”,也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话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家。鲍德里亚的这种批判符号学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学术界建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鲍德里亚之所以被称为“知识界的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方法层面都喜欢剑走偏锋,这使他容易获得学术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容易激起争议和批判。可以肯定的是,鲍德里亚对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特征的把握是准确的,从符号学角度对物体系的分析、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发现、对时尚、艺术品市场和后现代传媒文化的批判也是非常有力且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当代的经济社会文化语境中,对鲍德里亚的接受要有针对性和批判性,毕竟中国当前并没有全面进入西方式的消费社会,而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糅共存的不平衡状态。在经济上,我国目前总体上还主要处于一个生产性社会阶段,广大西部农村甚至还处于从前现代向全面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而不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西方式的全面的消费社会形态。然而,我们同样也要注意,在文化层面,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后现代消费文化在一线城市已经快速形成,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也日益加剧,从而使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西方式的消费意识形态正在中国社会全方位蔓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消费行为,并建构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消费文化形态和消费心理结构。因此,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传播媒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中,鲍德里亚的批判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他所采用的符号学方法也是可资借鉴的。

注释[Notes]

① 马克思的符号学思想已经受到了关注。代表性成果:西方学者奥古斯托·庞其奥(Augusto Ponzio)的《卡尔·

马克思的符号学》(“The Semiotics of Karl Marx,”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0.2(2014): 195-214)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本人其实也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因此可以看作一位未表明身份的符号学家。国内学者章建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写了《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符号思想》(《哲学研究》1993年第3期)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理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两篇文章,分别分析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符号思想以及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可能性。阿尔伯特·柏吉森(Albert Bergesen)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6.1(1993): 1-22)一文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符号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重要学术领域。近年来,青年学者张碧已经就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

②在鲍德里亚著作和文章的中译本中,对 Simulacrum(复数形式为 simulacra)和 simulation 的翻译是非常混乱的。Simulacrum 的译法有拟像、拟真、类像、仿像、仿象等,而 simulations 的译法有仿真、仿拟等。甚至有的译本恰恰相反,将 Simulacrum 译为仿真,而将 simulation 译为拟像。根据这两个词汇的基本内涵,本文用拟像(Simulacrum)和仿真(simulation)这一译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artlett, A. J., and Justin Clemens, ed. *Alain Badiou: Key Concepts*. Durham: 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 Baudrillard, Jean. *Simulation*. New York: Semiotext(e), Inc. 1983.
- .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 [Baudrillard, Jean. *The System of Objects*. Trans. Lin Zhim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让·波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Baudrillard, Jea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Xia Yi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 *The Consumer Society*. Trans. Liu Chengfu, and Quan Zhiga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 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 [Baudrillard, Jean.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Wang Weim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 :《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 [———.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Yang Haifeng. Beijing: Center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5.]
- :《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
- [———.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Che Jinsh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9.]
- 瑞安·毕晓普 道格拉斯·凯尔纳等:《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戴阿宝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 [Bishop, Ryan, and Douglas Kellner, et al. *Baudrillard: Memorial and Prospect*. Trans. Dai Abao.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Vol. 1. Trans. Liu 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 Genosko, Gary. *Baudrillard and Sig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Kellner, Douglas.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 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Kellner, Douglas, 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Trans. Chen Weizhen,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道格拉斯·凯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 [Kellner, Douglas, and Steven Best.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Trans. Zhang Zhibin. Beijing: Center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
- Lefebver, Henri.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London: Verso, 2002.
- .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Marx, Karl. *Capital*.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 He Daoku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 Pawlett, William. *Jean Baudrillard: Against Ban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 “Simulacra + Simulacrum.” *The Baudrillard Dictionary*. Ed. Richard G. Smit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马克·波斯特:《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张金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Poster, Mark.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Trans. Zhang Jinpe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Poster, Mark. “Semiology and Critical Theory: From Marx to Baudrillard,” *Boundary 2*, Vol. 8, No. 1, The Problems of Read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ism: A Symposium (Autumn, 1979): 275–88.
- J·雷契:《让·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齐鹏译。《世界哲学》4(2004): 108–10。
- [Reacher, J.. “Baudrillard's Symbol Value.” Trans Qipeng. *World Philosophy* 4(2004): 108–10.]
-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 [Simmel, Georg.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Trans Feiyong. Beijing: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 [Yang Haifeng. *Toward to Post-Marx*. Beijing: Center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4.]
-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
- [Žižek, Slavoj. *Event*. Trans. Wangsh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139页)

- [Xia, Yan. “For a Greater Leap of News Documentary.” *Collected Essays on Film by Xia Yan*.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1.]
- 张英进:《审视中国——从学科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电影与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Zhang, Yingjin. *China in Focus: Studies of Chinese Film and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民族、国家与跨地性:反思中国电影研究中的理论架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3(2012): 1–9。
- [——. “The Status of Theory in Chinese Film Studies: From Ethnicity and National Cinema to Translocal Practice.”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3(2012): 1–9.]
- 赵葆华:“电影的核心竞争力从何而来”,《人民日报》2016年6月3日。
- [Zhao, Baohua. “The Source of Films' Core Competitive Power.” *People's Daily* 3 June 2016.]
- 周平:“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思想战线》1(2017): 29–40。
- [Zhou, Ping. “Dual Structure of China's Nation Construction.” *The Ideological Front* 1(2017): 29–40.]
- 斯拉沃热·齐泽克:“《爱乐之城》:一种列宁主义的解读”,王立秋译。The Philosophical Salon <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la-la-land-a-leninist-reading> >
- [Žižek, Slavoj. “La La Land: A Leninist Reading”. Trans. Wang Liqiu. The Philosophical Salon <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la-la-land-a-leninist-reading> >]

(责任编辑:王嘉军)